

莫言在中东欧的译介、传播与接受

肖 进（海对外经贸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摘 要

本文尝试以莫言作品在中东欧的翻译和出版为对象，考察小语种国家对莫言的接受及存在的问题。以笔者搜集的中东欧国家译介莫言作品的第一手资料入手，就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东欧出现的“莫言旋风”现象，分析其作品在这一地区得到传播和接受的原因，同时展望中国当代文学在中东欧接受的前景、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法。

关键词

莫言；中东欧；文学；译介；传播；接受

作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中国，在全世界刮起一阵“莫言旋风”。已经有研究者就莫言在英美国家的影响和传播进行过研究和探讨。不过，衡量一个作家全方位的世界性声誉，据以评判的标准不能仅仅局限在本土和英语世界。从传播学的角度，在传播的深且广的层次上，更需要关注小语种国家的接受程度。虽然，本土和英语世界的受众在总量上占据优势，但传播不是量化，而是需要顾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有意义的信息接受与反馈。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对整个世界而言，作家莫言就成了一个有效的传播源，诺贝尔文学奖则转为一个强大的传播媒介。较之获奖以前，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几乎呈爆炸式展开。不仅原来产生影响的语种和区域更加深入，在众多小语种的国家和地区，莫言及其作品也第一次形成了全方位的辐射。本文主要探讨的，即是以中东欧为中心的小语种国家对莫言的译介和接受。以第一手资料数据为支撑，探讨莫言小说在中东欧的传播情况，分析“莫言旋风”形成的原因，展望中国当代文学在中东欧的接受前景，指出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法。

—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文学并不陌生。1909年周氏兄弟翻译的《域

外小说集》中，尤其注重东欧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对于这一点，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说，当时他们“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域外小说集》中的作者，大多是俄国及东欧弱小民族的作家，像波兰的显克微支，波斯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1917年，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也侧重于介绍东欧国家的文学。全书50篇小说，其中包括塞尔维亚等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鲁迅亦称赞“所选亦多佳作”，肯定其成就。鲁迅和周瘦鹃外，施蛰存也非常关注东欧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学。1936年，施蛰存编译出版了《匈牙利短篇小说集》，1937年编译了《波兰短篇小说集》，1940年代又先后翻译了显克微支的小说和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诸国的短篇小说集《老古董俱乐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文学上的交流日益频繁，不仅有更多的文学作品被翻译，而且还互派留学生，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学和艺术。总的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中东欧文学的引进、译介一直没有中断，但中东欧地区对中国文学的引介却并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中东欧国家还是相对陌生的。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和中东欧文学交流的一个重要契机。由于诺奖在全世界的声誉，中东欧国家对莫言作品翻译的遍地开花的态势，已经显示出中国文学开始逐渐深入地走进中东欧。

为了能更好的了解中东欧国家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笔者利用身在中东欧的地理优势，走访了一些汉学家和中文译者；同时，也利用互联网和当地报刊媒体等平台，用中东欧地区的不同语言查询了这些国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状况，整理了中东欧十个国家对莫言作品的翻译情况(未列出名字的国家，就笔者检索的材料，尚没有发现对莫言作品的翻译)。

表1是笔者整理的莫言作品在中东欧的翻译，按照语种、作品中文名称、外文名称、译者、出版社和出版年份排列。表中所列外语均为该国语言。

语种	中文名称	外文名称	译者	出版机构	出版年份
阿尔巴尼亚	《蛙》	Bretkosa	IljasSpahiu	Onufri	2013
保加利亚	《生死疲劳》	У м о р а ж и в о т и с м ъ р т	HinovPetko	Л е т е р а	2014
波兰	《丰乳肥臀》	Obfitepiersi, p e 颯 ne biodra	KatarzynaKu lpa	Warszawa: WydawnictwoW. A. B	2007
	《酒国》	Krainawódki	KatarzynaKu lpa	Warszawa: WydawnictwoW. A. B	2006
捷克	《丰乳肥臀》	Krevamlíko	DenisMolano vn	Mladáfronta	2013
罗马尼亚	《红高粱》	SorgulRosu;	DinuLuca	HumanitasFiction ;	2008
	《变》	Schimbarea;	DinuLuca	De:Seagull;	2010
	《生死疲劳》	Obositdeviat 颯, obosit demoarte;	DinuLuca	HumantasFiction	2012
克罗地亚	《变》	Promjara;	Karolina 譚 vencbir Bouzaza	Zapre 幫 i:Fraktura;	2013
	《酒国》	RepublikaPijana aca	ZvonimirBar etic	Portalibris;Beog rad, Sr.	2013
塞尔维亚	《蛙》	Zabe	AnaJovanovi c	Laguna;Beograd, S r.	2013
斯洛文尼亚	《灵药》	Drog	KatjaKol 幫 ek	Litera, ZbirkaBab ilon, Maribor	2007
斯洛伐克	《民间音乐》	zudováhudba	AnnaDole 鯀 alová	A. Marencin	2008
匈牙利	《酒国》	Szeszf 鯀 ld	Kartonalt	NoranLibroKft.	2013

这个表向我们展示了中东欧国家译介莫言作品(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特征:

第一,从作品翻译的年份上,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除波兰等少数国家外,中东欧地区对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还是相当陌生的。举一个例子,2007年斯洛文尼亚译者Katja Kolšek翻译了中国当代文学部分短篇小说,名为Sodobnakitajska kratka proza:Naj cveti sto cvetou(《百花齐放: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子中收有王蒙、卢新华、张洁、张抗抗、残雪、余华、格非、王安忆、苏童、莫言的作品。在导言中,译者引用了19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意在提请读者注意翻译的多样性。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繁盛发展的时候,仍然把目光聚焦在新时期的“伤痕文学”,至少说明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陌生。而在2012年后,中东欧对莫言作品的翻译则成遍地开花之势。除少数几部外,所有的翻译作品几乎都是在最近两年出现的。莫言成为中东欧国家最熟悉的中国作家。不仅如此,很多国家对莫言作品的翻译,是直接从中文翻译成该国语言,而不是从英语版本转译的。这体现了翻译者对原著的忠实,也是中国文学近些年来在中东欧国家逐渐形成影响的表现之一。

第二,与英美国家的译介相比,中东欧地区对莫言作品的选择也有一定的特点。根据表1分析,《变》、《蛙》、《生死疲劳》、《酒国》是受关注最多的几部小说。而对于莫言早期的代表作《红高粱》和《丰乳肥臀》,则没有体现出较多的兴趣。至于莫言其他的长篇小说,如《天堂蒜薹之歌》、《四十一炮》、《檀香刑》等,根本就没有进入中东欧的视野。这说明中东欧对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还很不全面。对《变》这部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的翻译,显示出其重点是在通过自传了解莫言,向读者介绍这位新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对《生死疲劳》和《蛙》的重视,基本上体现了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翻译程序:首先翻译其获奖作品。虽然,诺奖委员会并没有明确指出是莫言的哪部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当记者问莫言最想推荐给欧美读者哪部作品时,莫言推荐了《生死疲劳》,“因为这本小说里边有想象力,有童话在里边,也有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至于《蛙》和《酒国》这两部小说,在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中,是和《丰乳肥臀》一起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提名小组主席佩尔·瓦斯特伯格所提到的作品。这也使得很多国内的媒体纷纷认为《蛙》是莫

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至于莫言获奖之前，一些译者对《灵药》和《民间音乐》的翻译，仅仅是作为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并未见有什么影响。

第三，译者与出版。与莫言作品的英语、日语、法语和瑞典语译者相比，中东欧的译者相对分散，且大多并非专业的当代文学翻译者。现在几乎公认的是，莫言作品获奖的重要原因在翻译。英译者如葛浩文，日文译者如吉田富夫、瑞典文译者如陈安娜等，都对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甚至认为，“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根据笔者与中东欧译者的交流，大部分的中东欧译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了解不深，更谈不上研究。多数译者仍然谨守欧洲汉学的传统，醉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如《诗经》、《红楼梦》，乃至《围炉夜话》、《三十六计》等。对当代文学的翻译只是偶尔为之。另一方面，莫言作品在这一地区的翻译，多为出版社约译。也就是说，出版社针对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巨大的传播媒介，从翻译市场的角度出发，选取莫言的某一部作品，邀请译者进行翻译。因此，译者对翻译哪部作品没有主动权，一切都要满足于出版社盈利的目的。这既限制了译者的选择和发挥，也影响了译者对所译作品的兴趣。⑦除非出现像 The Dalkey Archive 这种非营利性的出版社，才能更好地发挥译者和编选者的才华，对翻译对象有更多的文学上的考虑和建议。

二

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在中东欧的接受与传播，既有现实的表层因素，又有较为深层的文化动因。现实因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影响力，使得中东欧的读者不得不关注莫言和中国当代文学；二是中国近些年来文化软实力的延伸，使得中东欧的读者开始意识到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深层动因则在于，中东欧读者对莫言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体现了欧洲汉学历史性的“接续”。这种历史性“接续”的关键点在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持续关注：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传教士时期的儒家文化西传，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印象深刻。莫言小说中的传统性、民族性，都让西方的读者感觉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其文化上的吸引力自不待言。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东欧国家大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兴趣点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好奇莫言作为中国本土的一个非异议人士，获得此奖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其次，与此相关联的，是不约而同的对莫言作品中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推重；第三，非常关注莫言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如莫言作品中对章回体的借重，对传统讲唱文学的重温等。

作为对中国当代文学还相当陌生的中东欧，其最直接信息源的获得不外乎诺贝尔委员会对莫言获奖的颁奖词。在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中，非常明确地打造了一个拉伯雷、斯威夫特、马尔克斯、莫言的文学谱系。但显然，莫言后来居上，“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个中原因在于，较之于这些前辈，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这个评价，一方面看到了莫言写作的国际化的一面（魔幻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本土化、民族性的一面（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这两个相反相成的因素是莫言走向世界的重要支撑。唯其具有国际化的写作，才能进入西方读者熟悉的视域，使得他们把挑剔的目光转向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而唯其具有民族性，也才能吸引西方的读者逐渐走进中国的文学、社会和传统之中。也正因为如此，一向作为西方作家专利的诺奖才对莫言大加赞赏：“莫言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曾有论者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他的小说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丰富书写与批判性的表现，由于身后的民族文化载力与鲜明的人文主义立场，与“经济崛起”、“国家强盛”之间并无对应性的关系。这固然体现出作者对诺奖开放眼光的肯定和对汉语新文学一百年来发展的自信。但是，如果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待莫言在中东欧乃至全世界的译介和接受，“经济崛起”、“国家强盛”作为一种背景化的东西，形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处不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解：首先，作为GDP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中国对于中东欧的经济发展而言，已经成为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合作伙伴。在中东欧经济转型，发展陷于停滞状态的困窘形势下，中国是带动其复兴和繁盛的强劲动力。这连带着带动中东欧在文化意识上对中国的开放和拥

抱。自 2010 年以来，中东欧和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2012 年 4 月，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在波兰华沙会晤。双方发起关于促进中东欧与中国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措。同时，一些中东欧国家(如斯洛文尼亚)，借建交周年为契机，以纪录片和图片展的形式，向中国人较为直观地展示其文化面貌。2013 年 11 月，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行会晤，期间发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纲要》的第七条专列“活跃人文交流合作”项目，给中东欧和中国在文化、旅游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建立了制度性保障。其中，决定每两年举行一次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和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合作论坛，从制度上确定了中国和中东欧的文化交往。^⑩中东欧国家和中国的文化合作论坛在相互尊重、平等互鉴的基础上，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和共同繁荣，培育市场化运作能力，推动各自的文化机构、专业组织和国际艺术节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开展交流与合作。中东欧国家在对中国时所展现出的开放姿态，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莫言的作品能在许多国家得到传播和接受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经济崛起”、“国家强盛”也体现在以经济做后盾的文化软实力的凸显。这主要表现在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策略。与经济相比，文化的力量相对柔和、感性，也更贴近人心，在相互的交流中最容易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力量。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平台，孔子学院的作用不可低估。2012 年以后，中东欧国家掀起的“莫言热”，不仅因为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与孔子学院以多种形式进行的推介密不可分。如斯洛文尼亚虽然早在 2007 年就翻译了莫言的短篇小说，但是近些年来却出现翻译后继乏人的现象。莫言获奖后，孔子学院以开展讲座、组织交流研讨等形式，让更多的斯洛文尼亚民众认识、了解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保加利亚孔子学院得知汉学家韩裴(Petko Hinov)在翻译莫言的《生死疲劳》后，邀请他到孔子学院为汉学专业的学生和汉学爱好者作关于“论翻译——以莫言小说《生死疲劳》为例”的讲座。把本来属于一个译者的默默无闻的翻译工作转变为对中国文化的宣讲和认识。克罗地亚的孔子学院联合莫言小说《变》的译者 Karolina Svecbir Bouzaza，组织一个特殊的“朗诵会”，用克罗地亚语、英语和汉语分别向观众朗诵这部小说，以直观的方式传达具有浓厚中国意味的文化气氛。在塞尔维亚，则是由孔子学院和塞尔维亚 LAGUNA 出版社共同组织关于

莫言的座谈会。专程邀请中国专家主讲。座谈会同时配以多媒体宣传材料，向在场的二百多名贝尔格莱德市民和学生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状、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莫言生平与创作和莫言代表作等。讲座还引起了塞尔维亚媒体的广泛关注，电视台和主流报纸进行了采访和报道。随后，由 Ana Jovanovic 翻译的《蛙》在塞尔维亚出版。这种由出版社、孔子学院和当地主流媒介共同推动的文学译介和交流几乎是中东欧进行文化推广的一个良性循环模式。孔子学院在这中间不仅起到了媒介的作用，还以自身为基础，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

现实因素之外，中东欧作为欧洲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门户，与中国也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根本上说，莫言小说在中东欧的接受，既体现了西方在几个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持续关注，也是他们拓展关注视野的一个有效窗口。在某种意义上，这反映了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对东方文化的“重看”和“接续”。对西方而言，传统中国始终是作为东方的神秘“他者”而存在的。可以说，中国和西方的交流历史，也是西方的一些先驱者们逐步揭开中国的神秘面纱的过程：蒙元的强大令西方惧怕，明清的停滞令他们失望，二十世纪后的中国如何走向，其实与整个世界都有关涉。当下的中国已然是一个经济巨人，GDP 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然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重要的同时，又让西方感到畏惧，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便是这种畏惧的一种体现。如何了解中国，从何种视角观照中国，成为许多西方人考虑的重点。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让他们看到，从文化视角了解中国是一个重要选项，也是极为重要的契机，因为，文学的每一步前行，都不仅仅只关乎文学。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里显然存在一种“推移”。不仅是研究对象的“推移”，也是研究思维的“推移”。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效果，远没有从中国带回去的文化更让欧洲人震惊。儒家文化在抗衡基督上帝的同时，也给西方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几乎每一个有主动意识的传教士都或多或少的在西方传播了儒家文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虽然西方的研究者仍然把目光聚集在中国古典文化上，但中国社会的变化已吸引他们不得不关注新的发展。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当代中国的社会变化催生了当代的文化和文学，西方的读者如果想要了解当代的中国，就必须首先明了当代文学在接续传统和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所具备的独特特质，进而才能解读中国何以在当下的世

界上如此重要。对西方而言，这一解读是无比重要的。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在其成熟著作中，立足点往往扎根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而技巧和眼光却带有世界性。莫言作品中中国传统文化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深入结合，不仅可以让西方的读者重温千百年来神秘的东方文化，更看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结合体。在那里，传统不仅走向了现代，传统还进一步和世界潮流汇合。很难分清哪里是传统中国，哪里是魔幻现实主义，哪里是现代中国，所有这一切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如果说莫言的作品之于西方读者的真正魅力，可能就在于此。

三

总体来看，借助于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强大的传播源，莫言小说在中东欧普遍性的被接受，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中东欧传播的一个良好开端。但也要看到，无论是从翻译的数量和质量上，这一开端都还只是表层的、散碎的，并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能够自我生发和良性循环的译介传播渠道。前述提到，因为地域和语言的复杂性，中国当代文学在中东欧的传播有其不同于英美语言国家的独特性。这就是说，莫言小说在中东欧的传播，既存在着美好的前景和空前的机遇，也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挑战和问题。

文学交流的机遇离不开整体性的交流和发展。莫言小说在中东欧的译介，主因虽然是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刺激，但其背后却体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大杠杆功能和中国在国际社会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作用。东欧解体之后，中东欧国家的民族性益加凸显。其标志就是对本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认同。与此同时，中东欧各国也加强了自身同外界的经济文化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东欧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想象、接触乃至接受上起到了强劲的触发作用。可以说，通过阅读莫言所产生的对当下中国的想象，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往来带动文化交流这样一个简单的因素，这背后其实隐含着中东欧国家对中国作为巨大的经济体“他者”存在的文化审视和想象，中东欧作为一个地缘性强的区域，在面对中国时，其本身就对中国存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认为，以小说和报纸为载体的印刷资本主义在建构民族国家想象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⑩

就现代民族国家而言，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的莫言小说，正向西方读者展示着一个旧而新、传统而现代的中国形象。这是一个中国人用自己的体验和阅历，

观察和思考而写下的印记，其中有光明，也有悲苦和阴郁，这既不同于那些身处异乡的中国人笔下的单纯想象与回忆，也不同于意在观察中国的外来者肤浅的了解和认知。它有批判，也有怜悯；有嬉笑怒骂，也有正襟危坐的深刻思考；他并未就所述问题和现象给出现成的答案，但其所述所讲，却给人留下了开放的思绪。这一切，在西方读者头脑中凝聚成一个可感可知的现代中国，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

但这毕竟还仅仅是一个开端。如果说莫言在中东欧国家掀起了中国文学的“热潮”，那么，冷静打量的话，这个“热潮”里尚存着许多可能使它冷却的因子。我们必须发现并辨析这些“冷却因子”，在看到机遇的同时充分估量挑战并且努力使挑战转化成机遇，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当代文学在中东欧的传播才能够形成良性发展的循环，真正达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的。

挑战之一是翻译问题。大多数中东欧译者并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和跟踪分析，“偶尔为之”是其主要特征。这是这些译者与葛浩文、陈安娜、吉田富夫等译者的最大区别。“偶尔为之”造成的后果是，莫言作品虽然在中东欧呈现遍地开花之势，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译介，但译作不多，不系统，总体上呈碎片化、表层化现象，并且很少有研究性的学理支持。基本上每个国家翻译的作品只有一部或几部，绝大多数是介绍性的，远远谈不上深入；其次，由于国家小，人口少，语言单一，读者对译介作品的接受度也相当有限。据笔者在中东欧国家授课和调查的情况，很多汉学系学生对中国当代文学极为陌生。如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汉学系竟然没有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师，学生自然难以接触到中国当代的作家和作品，调查结果也显示，大多数学生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几乎全然不知；第三，就笔者所了解，中东欧国家的译者虽然多是汉学家，但在汉学领域却并不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这主要是和欧洲汉学的传统有关。和美国汉学相比，欧洲汉学仍然强调以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研究为中心，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注不多。权威的欧洲汉学家大都以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典籍的研究为主，这就决定了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和译者的尴尬地位。举例来说，2007年翻译《百花齐放：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斯洛文尼亚汉学家KatjaKolšek，2010年翻译莫言自传性小说《变》的克罗

地译译者 Karolina SvencbirBouzaza, 都是年轻的汉学学习者, 对当代文学的翻译还处在尝试阶段。KatjaKolsek 在翻译这部小说集之后便离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 从事政治哲学研究。保加利亚的译者 HinovPetko 甚至直接对笔者说, 相对于中国当代文学, 他更喜欢《诗经》、《围炉夜话》和《红楼梦》, 翻译当代文学作品只是偶尔为之的行为。可见, 中国文学要真正深入中东欧, 选择和培养优秀的译者是当务之急。

当代文学译者的稀缺甚至凋零的现象和这一区域的汉语教育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关联。1990 年代东欧解体之后, 中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着欧化趋势。与 1950 年代相比, 中国文学与这一区域的交流大大降低。以大学汉学系的发展为例, 中东欧很多大学的汉学系建立时间很早, 像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汉学曾经非常发达, 1990 年代以来, 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 这些汉学系的发展大多陷入停滞状态。前文所说卢布尔雅那大学长期没有中国文学教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近些年来, 随着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建立, 中国在中东欧的文化推介推动了汉语教育的发展, 中国当代作家和研究者与中东欧的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多,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 只有把语言传播、文学交流和文化交流结合起来, 形成合力, 才能形成深刻的影响。

挑战之二是交流问题。程光炜在谈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的时候, 提出了当代作家海外演讲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作家到海外去演讲和交流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因为演讲可以通过大众媒体迅速提升演讲者在文学受众中的知名度, 借此平台使其作品得以畅销, 进入读者视野”。莫言在获得诺奖之前和之后, 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多所大学进行过访问和演讲, 这些访问对象中主要集中在英美国家, 显然, 莫言的作品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得到有效地传播。据何明星的统计, 在莫言的所有作品译本中, 英译本馆藏最多; 其次是莫言的作品在北美传播的最广泛。反观中东欧, 莫言和这一地区的交流却几乎是空白。莫言去过和中东欧距离最近的意大利、土耳其, 却没能到中东欧国家与作家和同行进行交流。不仅是莫言, 中国当代作家整体上与中东欧文化界的交流也不多。2012 年中东欧国家斯洛文尼亚举办国际文学节, 邀请了中国诗人王家新参加, 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只是类似这样的交流太少了。程光炜在文章中提到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来中国演讲的“盛况”: 不仅“北京的主流媒体、主流翻译界、当代重要作家、以及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西班牙文学的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的师生”都参加了演讲，而且连远在上海的大众传媒都迅速报道了这个消息，这足以说明略萨的影响超出了“专业圈子”的范围。相信如果莫言能到中东欧国家进行访问和演讲交流，其对文学译介和接受的推动力当是巨大的。

挑战之三，文学的海外传播缺乏国际经纪人。艾布拉姆斯在名作《镜与灯》中曾提出著名的文学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和欣赏者。这是一部作品从写作到接受的几个必要因素。同样，一部文学作品要成功进行海外传播，也需要类似的几个条件，那就是作家/作品、译者、经纪人、读者。在这几个因素中，经纪人的地位尤其重要。经纪人不生产作品，也不翻译作品，其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不是文学问题，但是在中国作家作品的海外传播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纪人的主要功能是推动作品的传播。他的一边是作家/作品，另一边是市场。只有经纪人把市场做好了，做大了，作家的作品才能得到更多人的阅读和接受。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曾有人预测，“莫言效应”可能会引起国外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暂时关注，但注定不会持久，^⑩原因就与中国作家作品海外传播的代理机制缺位有关。对大多数中国作家而言，国内长期形成的文艺机制使他们对代理人问题显得陌生。作家蒋子丹质疑说：“作家还有经纪人，我没听说过”；王安忆表示，杂志的编辑会主动帮助作家发表作品，她也不认为中国需要作家经纪人制度。阎连科则直言自己养不起经纪人。莫言自己则因为授权女儿代理自己引起争议。如果说就国内的现状来说，代理人问题还没有达到至关重要的地步的话，那么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则表明，作家要想自己的作品在海外有更多的读者，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寻找合适的代理人是势在必行。莫言的小说在中东欧国家的译介，如果经由好的译者、好的代理人和好的出版机构经手的话，相信会突破当下的表层与散碎，得到更有深度的传播和接受。